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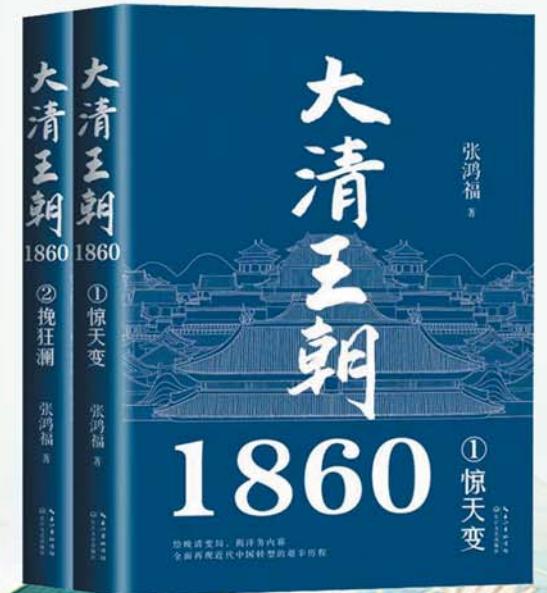
张鸿福沉潜研究中国近代史多年,既有小说家的敏锐和勇气,又不失史家的严谨和公允。其作品深深植根于史实而未囿于史事,而是拆除了历史的壁垒,扩张了小说的界限,让久远的旧人旧事具备了现实的映像,由此我们看到的清朝故事便不仅是苦大仇深的苦难教材,而是混同在尘埃里的光:它从百年的尘埃里来,又穿越了百年的尘埃。

最近,张鸿福的清朝故事再添新著——《大清王朝1860》(以下简称《大清王朝》)。这部七十多万字的两卷本长篇,仍是他所擅长的历史题材,只是不再围绕单一主角专作人物传记,而是截取了从“庚申”(1860)到“甲午”(1894)这一特定时段,述写了那一场回光返照中的晚清“中兴”。

从庚申到甲午, 晚清“中兴”的挽歌

——评张鸿福作品《大清王朝1860》

□赵月斌



讲述危局下的被迫“自强”

正如美国史学家芮玛丽所说,在国内叛乱频仍、外敌侵扰不断的危局中,“不但一个王朝,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,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,它们终于死里求生,再延续了60年。是为同治中兴。”在她看来,这个百病缠身的腐朽帝国之所以没有轰然覆灭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。

晚清是离我们最近的古代,也是离我们最远的现代。如果说“洋务运动”只是一曲起调高亢的挽歌,至少那些倾力引吭的歌者唱出了现代的先声。《大清王朝》着眼

于这场亘古未有的天下、时局之变,运用疏放通脱的笔墨,绘出了洋务运动的来龙去脉,写出了备受鄙夷的清廷改革者如何不由自主地“卷入”万国竞长的世界洪流,进而化被动为主动,开启了一条富国强兵的自强之路。从小说的两个分卷标题《惊天变》和《挽狂澜》,也能看出作品为这段不长的历史创设了雄浑的格局,而从小说最初拟定的题目《补天憾》,更可想见作者试图重述一个虽败犹荣的悲情神话。

洋务运动又称“自强运动”。“自强”二字源出《易经》(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),晚清时期的王韬、丁日昌、郑观应、郭

嵩焘等西洋通就经常引用该书观点,借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的祖宗之言破除积弊成痛的“祖宗之法”。从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到“师夷长技以自强”,虽只二字之差,却也说明人们不仅转变了对“夷务”的偏见,更认识到“制夷”只是逞一时之快,“自强”方得以扶正固本。

《大清王朝》贯穿始终的主线便是洋务派奉行的自强之道,孜孜以求的自强之术。小说借奕䜣、文祥之口说出了“自强才有出路”,他们认清了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,故能抓住千载难逢之“运会”,短短的二三十年,竟营造出了一种颇有梦幻气

质的近代工业文明新气象。一时间,从京师到闽粤,从北洋到南洋,几乎遍插“洋务”的旗帜,许多延及当今的政企架构、民族工业就是那样平地起风雷,让停留在古代的中国大步迈向了现代,虽然还只是迈出了一只脚,但是这一只脚已端开了变革之门。张鸿福之所以写洋务运动,正是看重了它的开创之功,他未以简单的成败论为其盖棺论定,也未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将其涂抹得黑白分明,既肯定了“洋务”之进步,亦指明了这种“进步”的不足。基于此,《大清王朝》的重心便是书写洋务运动来之不易的工业化成就。

在事件中钩沉历史细节

可是,洋务运动三十年,既有中西交汇,又有新旧更迭,可谓头绪纷繁且枝杈交错,人物众多而鱼龙混杂,面对大清王朝这样一段晦明不清的历史,如何进行不拘于形的历史叙事?

张鸿福似乎轻巧地跳出了“洋务运动”的一团混沌,他不是以讲古的方式去附和历史,而是把历史事件作为叙事主体,用史实推动故事情节,在情节中凸显人物,由此写出了“大清王朝”那一特定阶段的形影与神髓。从小说的结构形式上看,大概采用了一种纲目明晰的伞盖式结构:他拂去了1860年的尘灰,撑开了“大清王朝”最后的华盖。

起首第一章为伞柄,讲述洋务运动的发端:1860年秋,负责“议抚”的钦差大臣

恭亲王奕䜣与英、法签订《北京条约》,化解了“毁城改朝”的危机,并在年底奏请朝廷设立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,以专门处理“夷务”,满清政府开始与世界接轨,“洋务运动”由此拉开序幕,奕䜣亦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,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。

第二章为伞骨,题为《政变》,叙述咸丰帝病死热河,六岁的载淳即皇帝位,由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八位“赞襄政务大臣”总摄朝政,两宫皇太后不满其“朋比为奸”“跋扈不臣”,联合遭受排挤的奕䜣发动辛酉政变(亦称“祺祥政变”),两宫开始垂帘听政,改年号“同治”,大清朝进入慈禧太后专政的时代。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节,却是承上启下的要害所在:慈禧与奕䜣的联手,朝廷对

洋务派的重用,让洋务运动具备了必要的前提,就如坚实的伞柄装上了牢靠的伞骨,下一步就是如何裁剪铺陈那华盖的伞面了。

所以,其后分别展示洋务运动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,或可看作五彩辉煌的“华盖”: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威力,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近代中国最大军工企业——江南制造总局;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,在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。他们联手徽商胡雪岩加盟投资,雇外国人做船政监督和工程师,不仅制造舰船,还设立了船政学堂和船政水师。由讲述近代军用工业的起步和发展,又过渡到轮船招商局(1872)、开平矿务局(1878)、中国电报总局(1880)、汉阳铁厂(1890)等重要新

式民用工业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(1885)的创办历程,这部小说的“华盖”于此完全打开。

《大清王朝》描写了洋务派、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冲突抗衡,具体刻画了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总推手奕䜣和地方上的执行人李鸿章、左宗棠、盛宣怀等代表人物以及唐廷枢、胡雪岩、朱其昂等民族企业家,倭仁、张盛藻、尹景霖等洋务运动的反对者,还有科林诺、额尔金、格兰特、华尔、白齐文、戈登等外国军政人物和日意格、达士博、巴尔栋、白尔思拔、德克碑、时维礼等一大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,可以说几乎写遍了洋务运动所涉及的关键人物,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创造了历史,同时又成为小说中被重新创造的人。

洋务“新气象”留下华彩剪影

守的产业格局,带来了自强、求富的新气象。

张鸿福曾表示,他写作此书的目的,就是要为近代中国的工业革命张目,对上下求索的先行者给予褒扬。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诚然至今不免差评,但是他们敢开风气之先,不啻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打响了第一炮,挖下了第一桶金,而今,有些跻身世界或国内前列的知名企业、大学,其源头就是洋务运动;还有人发现,有些标识为“汉阳造”的铁轨,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之后仍在正常使用。不可否认,我们的现代生活,我们身边的器物用具,或许就和当年的洋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们很可能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那顶“华盖”的余荫。正如小说结尾出现的那一片微光,

《大清王朝》无疑绘出了近代中国华彩乍现的一个侧影。

肯定进步的洋务派,批判落后的保守势力,发现洋务运动的正面价值,是《大清王朝》的基本色调。这部小说就像盛大巡礼一般,隆重张开了辉煌的华盖,展示洋务派取得的巨大成果,礼赞自强运动中一个接一个的巨大“胜利”。我们看到了具体的、阶段性的胜利成果,也看到了为之上下奔走的实业先驱,且体会到了作者所说的局限和不足,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全方位展现洋务运动专题史的重磅作品,却又多少感觉它和这段历史本身一样并未终稿。作者带来的全是天朝帝国的天籁之音,好像只要坚持把洋务做大做强,只要把自强运动推向极致,其补

天之梦即粲然可观。可是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流血的国度,以“中学为体”的工业化梦想,又怎么可能不破灭?若只是止于“西学为用”,就算中国“这块活的化石”被势不可当的大机器卷入世界文明之中,结果也只会被撞得粉碎。

读《大清王朝》,一则叹服它确实写出了作者所说的洋务运动之种种成就,一则又遗憾没有看到这种种成就背后的“不成”:它写出了这种种成就的因由,却没写出它们的去路;它写出了洋务先行之所得,却没写出体用两分之所失。从体量上看,《大清王朝》已出版《惊天变》《挽狂澜》两部,假如还有后续,倒是期待它走出历史演义的老套路,写出在前文本中涅槃重生的新历史小说。